



一次未公开的 珠峰探险

yī cì wéi gōng kāi de zhū fēng tàn xiǎn

1958年中苏联合登山队侦察组
考察珠峰始末纪实

翁庆章·著

中国文史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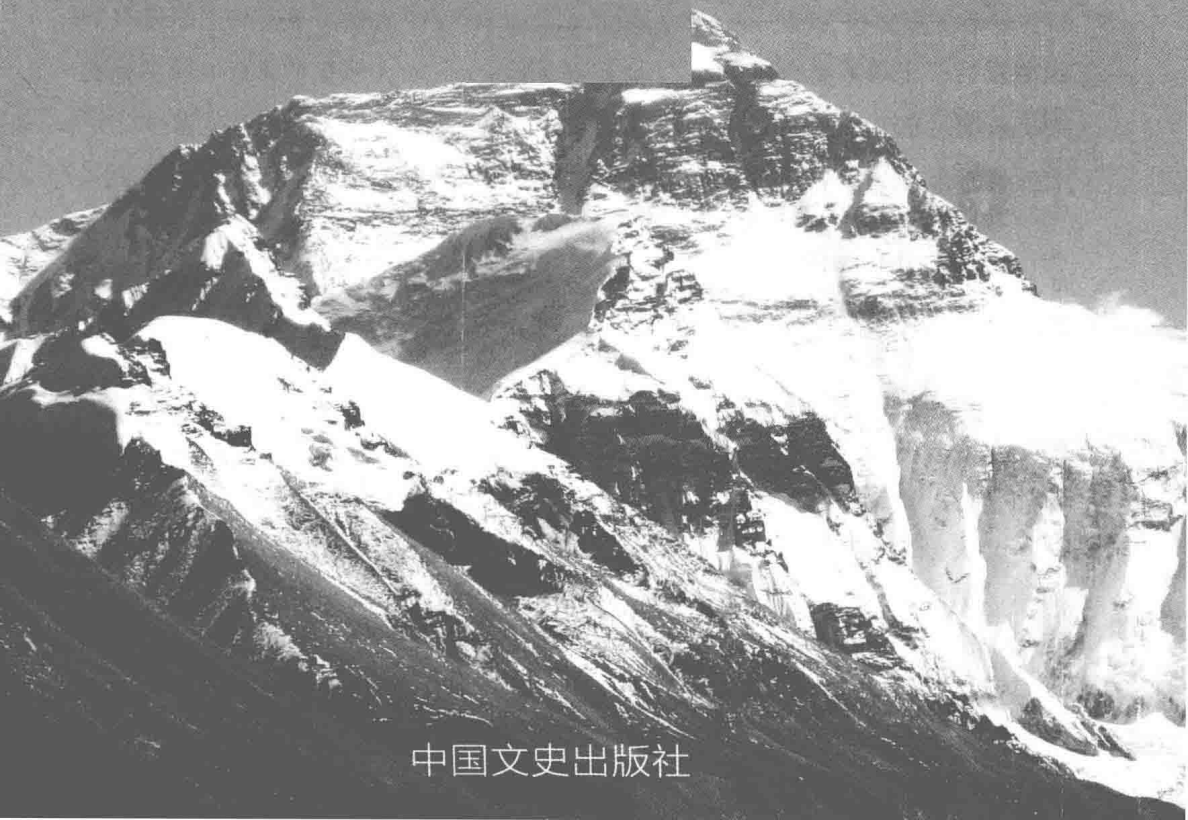


一次未公开的 珠峰探险

yī cì wèi gōng kāi de zhū fēng tàn xiǎn

1958年中苏联合登山队侦察组
考察珠峰始末纪实

翁庆章·著



中国文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一次未公开的珠峰探险：1958年中苏联合登山队侦察组考察
珠峰始末纪实 / 翁庆章著. —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 2017.4

ISBN 978-7-5034-8821-4

I. ①一… II. ①翁… III. ①纪实文学—中国—当代 IV. ①I2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003037号

责任编辑：刘 夏

装帧设计：陈欣欣



出版发行：中国文史出版社

网 址：www.wenshipress.com

社 址：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23号 邮 编：100811

电 话：010-66173572 66168268 66192736（发行部）

传 真：010-66192703

印 装：北京俊峰印刷厂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1/16

印 张：18

字 数：185千字

版 次：2017年7月北京第1版

印 次：2017年7月第1次印刷

定 价：39.00元



前言

我写本书的目的，是为了讲讲我亲历过的一起登山盛事，过去由于种种原因，没有完全公开过。现在半个多世纪过去了，我要把这尘封了几十年的往事披露出来，用个人的日记、信件和参阅有关的文献资料、书刊、公文档案、照片等记录以及登山战友们的共同回顾加以编织起来，把它们组成文字像片片的浪花那样倾入历史的大江大河之中，让后人知道它的来龙去脉。

中国登山队于1960年北坡首登珠峰成功，队中王富洲、贡布、屈银华三人实现了人类首次从北坡登上珠峰峰顶的壮举。此事在当年和随后已作过很多报道，是大家所熟知的事。

然而为什么年轻的中国登山队成立才5年，就在1960年一举挑战世界第一高峰呢？这得从1957年苏联登山界的倡议讲起，是苏联登山界首先提出要组成中苏联合登山队攀登珠峰，并先后上书苏共中央和中共中央（均经批准）。这么高规格的申报和审批是两国两党关系史中极为罕见的，也是历史条件造成的。首先是珠峰的北坡当年还从来没有人类登上过顶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英国队虽曾经攀登过7次〔有资料提到是8次，这之间差别在于是1935年为英国人莫里斯·威尔逊个人攀登（但是他也组织了几十个尼泊尔舍尔巴人支援的后勤队伍）。可以说是，英国队登7次，英国人登了8次〕，但都失败了。人们把珠穆朗玛峰这个特高海拔地区称之为地球的第三极，将它

与南极、北极相提并论。要想冲击世界第一高峰并试图登上世界最高峰峰顶这当然是件大事。

其次是中苏关系此时处于最佳时期，有这个氛围去共同携手干件让全世界瞩目的盛事，而且苏方还提出要以此项活动来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0周年，这自然也是很友好的表示。

经过会商，于是在1958年10月中苏双方组成侦察组去珠峰实地考察进山的路程、登山的路线、高山营地的设置和气象条件等。值得提到的是，这是我国人员有史以来首次抵达珠峰地区的群体，是一个具有里程碑式的记录。珠峰地区在我国西藏的西南部，平均海拔高度4000米以上，由于高寒缺氧，气压及氧含量为平地的 $\frac{1}{2}$ 左右（海拔5500米空气中的含氧量为平地的 $\frac{1}{2}$ 、7500米为 $\frac{1}{3}$ 、8000米为 $\frac{1}{4}$ ）。而且它的地理位置太偏远了，侦察组从日喀则骑马去就走了15天，那里只有当地附近的居民才偶尔到珠峰山下的寺庙去朝山拜佛。西藏解放前全境没有公路，运输基本靠骡马、牦牛。境内密布雪山、深谷，道路稀少、崎岖，旅途十分艰险。故西藏其他地区的大部分藏胞过去因交通不便，一般也无缘进入。

当时中苏登山会谈商定的是：1958年侦察，1959年试登，1960年登顶，用三年时间来完成。然而于1959年3月，中国登山队正在拉萨集训，苏联登山队即将于3月22日从莫斯科启程来我国与中国登山队会合进山之际，一个突发事件的出现，严重地干扰了登山队的进程，即3月10日西藏拉萨发生了分裂分子的武装叛乱。出于对运动员安全的考虑，中方通知苏方春季登山暂停后延。

中国登山队受困于拉萨之际，在西藏军区的领导下，成立了150人的武装民兵连，在拉萨的两天半平叛战斗中，配合解放军某部炮兵连（炮兵只能攻击远处，需要有步兵协防）坚守阵地。平叛胜利后，担任接收押运俘虏，奉派出100人参与搜索和警卫布达拉宫达半个月，派出50人参加拉萨军管会去接管有关寺庙等。这真是历史的机遇，一个国家运动队参加了平叛活动，而且还在当时西藏的政治中心、西藏地方政府的办公地——布达拉宫参加搜索和担任警卫、执勤站岗。

到了1959年10月，西藏局势已趋稳定，中方邀请苏方商谈拟于次年（1960年）恢复继续登珠峰，但此时中苏两党的分歧正在加剧，在苏方高层的干预和阻扰下，苏方登山界则借口技术准备不及而不来了。

处此进退的关键时刻，副总理兼国家体委主任贺龙试问了中国登山队的态度，登山队本着自力更生、发奋图强的精神，表达决心可以克服困难由中国登山队单独执行。经中央的批准后，在国内有关单位及西藏军区的大力支持下，1960年春季中国登山队200多人奋战在珠峰的雪山峻岭之间，克服重重艰难险阻，奋力拼搏，在付出一定伤亡代价下（牺牲2人，冻伤40多人），终于在5月25日由王富洲等三人胜利登上珠峰峰顶。

关于1960年登山队登顶的盛况，新华社驻队记者郭超人当时以《红旗插上珠穆朗玛》为题在国内各主要报刊作过长篇连载的报道。本书只对其中第四次行军、突破第二台阶、突击主峰等亮点作些陈述。另外重新采访了运动员，在他们的回顾中补充一些过去没有提到的情节。

本书着重对登珠峰前，登山队在1958—1959年为此做过的前期准备工作的经历作首次的披露。1958年中苏登山队侦察组赴珠峰，此事当时中苏双方都强调要保密，带到珠峰去的电台都用密码配备有机要员，这大概是当时的国际大环境，东西方两个阵营严重的对立所致，我们干些什么都不愿意让西方知道，也许还有在成功登顶后一鸣惊人的想法。所以中苏登山侦察组一行赴西藏在国内对外部的称谓是国家体委参观团。

中苏珠峰侦察组工作结束，联合登山队的中方人员于1959年初到拉萨训练时，仍沿用国家体委参观团的名号，直至当年底苏方决定1960年不来了，参观团的名称才终止使用。

从此关于1958—1959年中苏联合攀登珠峰活动的信息归于沉寂，也未对外公布过。直到1993年，中国登山协会出版的《中国登山运动史》上第八章第二节——“中苏联合攀登珠峰的协议及其终止”的段落中才有一页（P92—P93）文字记载，首次提到有过这么一件事，但无具体情节。

半个世纪过去了，当年参与中苏联合登山队侦察组的中方成员，有的偶

尔还能联系一下，有的长期卧病在床，已经有好几位不在人世了。1958—1959年中国登山队的经历是一个特殊的成长过程，它承载了若干个第一次的纪录和传奇，把这段历史事件的细节回放出来，将是我们这些亲历者的职责。

1958年的珠峰之行在日喀则以西，大部分都是在荒芜的、人迹罕见的崇山峻岭中穿行，但也经过了萨迦、协格尔等宗教圣地，所以一路既充满着艰辛，也饱览了奇异的风光。为了增加可读性，本书增添穿插了珠峰的地理、历史背景、沿途的风土人情及有关科学考察等。

经过几年的收集资料和走访，在当年登山战友的鼓励 and 帮助下，我决定以纪实的写法，尽可能地把当年的经历原原本本地表述出来。

我从1955年大学毕业时开始记日记，直到现在，已经历了60年。1958—1960年这三年有特殊任务，我也记载得比较翔实一些。如今把当年的日记找出来，经过整理，以日记记事的形式为主线，采访了当年同事的回顾并查阅了国内外登山文献和大量的体育档案，特别是体育博物馆保存的登山案卷。把其中重要者进行了摘录引用，从中也可见当时中央对此项活动的重视和特殊的关注。

本书主要是根据各方的史料写成的，有些场景也是由当年登山队员亲自的见闻、回忆提供的，其中重要的情节至少要经过两人以上的核对才予以收纳。希望本书能起到史料的作用，从中见证中国登山队在建队初期一段经历困难的过程及其成长。

笔者的能力和水平有限，书中难免有不够准确和错漏之处，请各有关方面、登山队老战友及关心登山事业的同志们及读者们给予批评和指正。

翁庆章

目录

前言 / 1

序 / 1

一、问题的提起 / 3

二、苏方的建议 / 6

三、中方的考虑——一波三折 / 9

四、珠穆朗玛峰的地理背景 / 16

五、珠穆朗玛峰的名称 / 20

六、珠穆朗玛峰的高度 / 27

七、攀登珠峰简史 / 33

八、中苏登山第一次会谈 / 48

九、中央对攀登珠峰实施计划的批准 / 50

十、进山的准备工作 / 52

十一、侦察组的组成 / 69

十二、启程——北京至拉萨 / 73

十三、在拉萨的进山准备工作 / 79

十四、至日喀则 / 94

十五、日喀则至绒布寺 / 102

十六、 珠峰北麓下的绒布寺 / 120

十七、 兵分两路上山侦察——东绒布线路、主绒布线路 / 125

十八、 大本营的建立 / 136

十九、 实地侦察工作结束，留下科考组过冬 / 144

二十、 侦察组返程——经日喀则—拉萨—北京 / 148

二十一、 拉萨至北京 / 163

二十二、 中苏登山第二次会议 / 166

二十三、 在拉萨训练、拉萨发生反革命叛乱、经历平叛及转移 / 170

二十四、 中苏登山第三次会谈 / 210

二十五、 苏方退出，中方决定单独攀登 / 220

二十六、 1960年中国队登顶成功，国内外的反映 / 226

二十七、 对珠峰的科学考察 / 261

二十八、 尾声 / 271

后记 / 277

参考文献 / 279

序

翁庆章同志是我国第一支登山队的运动员兼医生。他参加了1956—1978年我国早期的主要登山活动。这些活动大部分都在当时的报刊上作过充分的报道，受到过广大读者的关注和欢迎。

但是唯有关于中国和苏联联合组成登山队攀登珠穆朗玛峰这件大事，过去由于种种原因却从未公开宣布过。如在1958年中苏双方对珠峰进行了一次联合实地侦察，因为双方均强调要保密，进藏时用的名称是国家体委参观团。到1959年春，中方登山队员在拉萨集训。3月10日西藏分裂分子在拉萨等地发动武装叛乱，这个突发事件使当年预定的中苏联合登山暂停后延。中国登山队则在当地组成了民兵连参加了平叛活动。经历平叛这件事除了中央新闻电影摄影厂随队的摄影师沈杰在他的《我的足迹》一书中（2001年出版）有部分提到外，其他均未曾公开过。到1959年底，中苏政治分歧加剧，苏方提出来不合登了。于是才演变为1960年中国登山队单独攀登珠峰，在中央的关怀和有关部门的大力支持下，全队经奋力拼搏，终获成功（此事当年已有过大量报道）。

翁庆章同志说，中国登山队1958—1959年那段在西藏的经历是登山队创业和成长中艰难的一页，也是光辉的一页，如果不把它写出来，留给后人，

这段历史的具体情节就会随着时光的流逝，烟消云散，被永远地淹没了，这太可惜。他说写这本书要按纪实的文字来写，写真人真事，不虚构，拿不准的宁可少写也不讲假话，要还历史的原来面目，我认同他是按这个设想做的。

我用了好几天认真地读完这本书的初稿，由于我的视力不好，只阅读了一部分，大部分是由我女儿朗读我倾听。从书中使我回想起当年与登山战友在高山雪峰并肩奋斗的情景，如历历在目，倍感亲切，对我仍然是一种激励。我也参加了1958—1960这三年的登山活动。我和翁庆章同志共同见证了中国登山队这一段光辉的历史。

我认为本书是一本纪实性、史料性、知识性的作品，文字朴实、内容丰富。它填补了我国登山史上一段重要的空缺。

我们期望，书中提到老一代的登山人为祖国的荣誉，为登山事业、为科学考察事业所表现的奉献精神以及登山作为一个集体项目所表现出的团队精神能为当代更多的青少年所理解和传承。



2015年

原中国登山协会主席

原中国科学探险协会常务副主席兼秘书长

一、问题的提起

在20世纪50年代，苏联的登山运动已很普及，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就有相当的基础，卫国战争中以登山运动员为主组成的高山部队在高加索山区抗击德寇累建功勋。苏联登山运动的蓬勃发展与苏联人民喜爱户外运动，有定期的休假制度以及物质条件丰富后在山区设置了度假、野营和登山基地，开创了客观条件有关。多年来在实践中已经总结出了一套攀登经验，登山运动的技术水平也挺高。他们还喜欢从事探险活动，较早就去过北极、南极和高山地区考察。而苏联本国内的高山并不多，其最高峰为海拔7495米的共产主义峰（原名斯大林峰），到了50年代中期，其著名高峰如列宁峰（7135米）、胜利峰（7439米）、本国最高峰——斯大林峰等已经全部登顶成功。下一步怎么办呢？他们想到了拥有众多世界一流高山的友好邻邦——中国。

早在1955年3月，中华全国总工会副主席刘宁一访问苏联期间，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即向刘宁一提出要求来中国攀登位于新疆的慕士塔格山（7546米）和公格尔山（7719米）。

当时新中国成立才六年，百废待兴，忙忙碌碌在建设新的国家，工农业处于优先发展的地位，文教体育事业也在相应发展。1954年在北京召开了

第一届全国工人运动会，显示群众体育在蓬勃开展，但竞技体育仍是萌芽状态，而在登山运动方面则是一片空白。

为了帮助我国开展登山运动，也为苏联日后来华登山铺路，1955年5月，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邀请中华全国总工会派人去苏联参加登山培训。由工会系统出面邀请，这是出于苏联管辖基层群众性登山活动（包括它的度假基地）都是由工会系统组织和管理的（大型的登山活动则由苏联体委负责）。当年5月中华全国总工会登山队应邀派出许竞、师秀、周正、杨连源四人赴苏参加在格鲁吉亚的登山教练员学校学习。这是我国运动员接受现代高山登山技术和中苏登山合作的开始。

接着在1956年春季，苏方派出2名登山教练来华，由全总从各产业工会抽调有一定运动基础的职工40余人在北京西郊八大处举办登山营进行登山的理论和技术授课，培训出了一批登山运动员。

1956年4月25日，成立不久的我国第一支登山队——中华全国总工会登山队30多人在苏联教练库金诺夫和兹维兹特金的指导下，队长史占春等31名运动员登上陕西秦岭主峰太白山（3767米）的顶峰。

对于这么一个新发展起来的运动项目，国家体委也给予了特别关注。1956年5月16日国家体委在其东楼礼堂召开的庆祝会上，体委主持常务的蔡树藩副主任在致辞中说“祝贺中国第一支登山队成立和攀登太白山的成功，登上太白山为中国登山运动的誕生日”。贺龙副总理出席了会议，在会上还给登顶运动员颁发了登上太白山的纪念章。

1956年夏季，苏联总工会又接受了10多名中国运动员在苏联的登山营进行培训。接着7~8月中苏两国运动员组成中苏混合登山队登上了位于我国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境内的慕士塔格峰（7546米）。这座山的攀登史上，曾有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和英国登山家希普顿试图登顶，但没有成功。此次有中方12人、苏方19人登顶；三周后中苏队攀登公格尔九别峰（7595米），中方2人、苏方6人登顶。正因为有了首次良好合作的顺利登山，今后联合去攀登更

高的高峰，也是可以想象和期望的事。

正如中苏登山队队长别列斯基在1956年中苏混合登山队登上慕士塔格山后，在苏联《劳动报》上著文中指出：“苏联登山运动员今后的任务，要向更高更困难的山峰进军，创造更优异的成绩，为了完成这一光荣的任务，就有必要与中国登山运动员密切合作，去攀登位于中国境内的世界级的高峰。”所以在1957年苏联向我国提出共同组队攀登世界第一高峰——珠穆朗玛峰，对于年轻的中国登山运动似乎显得有些仓促，但是对世界最高峰向往已久的苏联运动员来说，似乎是顺理成章的事了。

二、苏方的建议

1957年10月，苏联部长会议体育运动委员会登山运动协会主席团委员功勋运动员阿巴拉科夫、洛托达也夫、阿鲁弗林诺夫、马林诺夫、库兹明和运动健将阿尔金、波拉格夫、拉帕欣科夫、菲里莫诺夫、达依波克、萨多维基及格林基蒙特12名苏联登山界的知名人士联合签名致信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及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信中的主要内容是：要求苏共中央和中共中央批准组织中苏联合探险队，以便在1959年3~6月从北面登上埃佛勒斯峰（原信如此，接着我方复信用珠穆朗玛峰后，苏方以后对这个世界最高峰就一直用珠穆朗玛峰的称谓了）。

信的全文如下：

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1953年5月23日，尼泊尔的丹增·诺尔盖和新西兰艾特蒙德·希拉里2人（从南坡）登上了埃佛勒斯峰（珠穆朗玛峰——译注）——8882公尺，这也和征服地球的南北极一样，标志着人类深入地球各部的重大胜

利。1956年，瑞士爬山队的4个队员又第二次登上了埃佛勒斯峰。两次都是从南面、从尼泊尔方面登上去的。从北面登埃峰也有人作过多次尝试，1924—1938年就先后有8支英国登山队试图从北面登上该峰，但都失败了。这一任务至今尚未获得解决，它现在也同样具有体育运动的和地理上的重大意义。

近几年来，苏中爬山运动员顺利地进行了一系列的爬山探险活动。1956—1957年间，苏联登上了本国最高峰，叶·科尔热涅夫斯基峰（7495米——此峰为斯大林峰的塔吉克语的称谓——笔者注）、列宁峰（7135米）、胜利峰（7439米）、斯大林峰（7495米）。他们和中国爬山运动员一起（1956年）征服了位于中国境内的慕士塔格峰（7546米）和公格尔九别峰（7595米）。中国运动员今年又登上了贡嘎山（7590米）。中苏优秀运动员的成长经验说明，顺利登上世界最高峰是可能的、是有根据的。

目前14个高度在8000米以上的高峰中，已有11个高峰被各国爬山队员征服了。奥地利、英国、法国、瑞士、意大利、日本等国的爬山运动员在征服世界最高峰中作出了自己的贡献，只有社会主义阵营各国的运动员尚未发表自己的贡献。目前在爬山记录方面剩下来的任务是攀登尚未征服的三个“8000米”高峰和从北面登上埃佛勒斯峰了。为解决这些任务作出自己的贡献是社会主义阵营爬山运动员，首先是苏中爬山运动员的光荣事业。

因此我们认为我们有责任向你们提出要求，要求允许组织苏中混合爬山队，以求在1959年3—6月登上埃佛勒斯峰，并以此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十周年纪念的献礼。

为了进行总练习，我们要求在1958年从中国方面登上中国与巴基斯坦边境上的8000公尺高峰之一——喀喇昆仑峰。爬山队成员最好由20名苏联运动员、20名中国运动员、5名教练员、10名辅助人员（医生、无线

电报报务员、总务人员、炊事员）以及数名科学工作者组成。

这封信有几个附件，涉及“目前世界各国登高山的情况（西方攀登简史）及登埃佛勒斯峰的意义。信后还附有埃佛勒斯峰调查情况一份以及从北坡登埃佛勒斯峰的准备计划一份”。落款的地址是苏联部长会议体育运动委员会登山协会主席团，签名为上述的12人。

显然，这封信是在苏共中央同意了之后，于1957年10月发出，接着就寄到北京中共中央来了。